



圖一 清 冷枚 〈耕織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清 冷枚 〈耕織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風調雨順

盛清諸帝雩祀與龍神崇祀

侯皓之

中國古代以農立本，聖明君主莫不企盼風調雨順，萬物順利生長，天若亢旱，影響萬物生計，君主即應齋戒祭祀，祈求霽澤甘霖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祝》載：「掌六祈以同鬼神示，一曰類，二曰造，三曰檜，四曰禱，五曰攻，六曰說。」鄭玄注：「禱，禳水旱之祭。」東漢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解「禱」字說：「雩，禱。祭水旱。」仁君感懼天災，憂民所苦，舉行雩禱之祭，以禳除自然災害對百姓的侵害。事物之間互有感應，龍是先民想像出來的神獸，《易經》說雲從龍，顯見甚早已有龍神行雲布雨觀念，將雩祀與龍產生聯繫。《春秋左傳》云：「凡祀，啓蟄而郊，龍見而雩。」每年四月，人們將東方蒼龍星宿視作龍神，舉行儀式祭祀，祈求雨水。東晉道士葛洪在《抱朴子內篇·登涉》中談到：「山中辰日，有自稱雨師者，龍也。」反映到了晉代，龍能興雨觀念已深植人心。

國之大計在農，農之所望惟雨。天氣久暘不雨，或豪雨滂沱致災，皆

對百姓民生傷害甚鉅。盛清諸帝勤政愛民，若逢荒災致歉，除了積極救

災，推動各種應變舉措，協助百姓渡過難關，恢復生活秩序和生產能力。

盛清諸帝在實際施政作為以外，甚為重視祈雨祭祀，經常御駕天壇雩祭，企求雨順風調，百姓安居樂業。此外，盛清諸帝頗為重視龍神祭祀，不僅在直省修築龍廟，還敕予封號，藉由神威，安靖地方，五穀豐登。

聖祖敬慎 虔誠祈雨

康熙帝治國思維源自於儒家思

想，視農桑為國本，積極推動農業生產，實施配套性的農業政策，諸如改善地權、恢復耕地、鼓勵墾荒、指導生產、推廣品種、積穀備荒、賑濟災區、興修水利、修治黃河、簡化稅種，將丁銀和田賦作為徵稅物件等，涵蓋範圍包含土地、墾殖、糧食、勸農、賦役改革、水利營田、蠲免政

策，有效促進社會穩定與農業發展，為康雍乾盛世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。（圖一、二）此外，康熙帝重視各地情報，要求各地督撫定期報告地方雨水糧價，掌握訊息，當天災發生，立即推動賑濟救災措施，幫助災民恢復生活。具體農業政策係盡人事，還得適



圖四 清 冷枚 《耕織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年，但天意難違，太皇太后依然年高病故，成爲他心中難解之痛。此後，康熙帝僅在宮中齋戒求雨，不再親詣祈禱。

康熙帝曾親臨京西黑龍潭龍神祠禱雨。黑龍潭龍神祠，興建於明成化二十二年（一四八六），《帝京景物略》載龍王廟「前爲潭，：土人傳黑龍潛中，曰黑龍潭也。」明代黑龍潭龍王廟以禱望霖雨靈驗而著名。入清以後，康熙帝數次駐蹕於此祈雨。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），康熙帝降旨重建，親撰碑文，垂示神庥。黑龍潭龍神，靈顯素著，雍正帝將祠瓦改成黃色，再題〈黑龍潭碑文〉，勒石刻記，以昭敬禮。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，乾隆帝封黑龍潭龍神「昭靈沛澤」龍王，以示尊崇。

康熙帝相信，精誠所感，可以上邀天鑒。康熙五十年（一七一—）五月，康熙帝感冒體弱，仍惦記早象，諭命喇嘛等在各寺誦誦《甘珠爾經》，求降霖澤。（圖三）清史學者莊吉發教授指出，甘珠爾是藏語「bKaḥ-gyur」的音譯，意即「教



圖三 清 乾隆朝 內府 《泥金寫本藏文甘珠爾經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救譯典」，爲佛陀所說教法的總集。祈雨無效，旱象未解，康熙帝甚爲焦慮，決定求助佛力，懇祈甘霖速降，以濟生民。康熙帝重視祈雨，甚至研究傳聞奇技，指出：「書冊所載，有所謂雷斧、雷楔者，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，得自平原者皆銅，朕所得甚多，將小石一塊，置於泉水攪之，即可祈雨。」降雨是自然現象，必須要有適當的條件，才能凝水降雨，雨量多寡，端視大氣水氣含量，祈雨其實實是安慰心靈的儀式，即使得雨，實與天庥無關。時代條件不同，以今觀古，不能用現代知識苛求古人，然而觀察康熙帝言行舉止，時刻莫不以國家民生爲念，實爲一代愛民帝王。

世宗崇龍 屢修龍廟

雍正帝承襲以農爲本政策，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，發布上諭，指出「士農工賈，皆賴食於農，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。」農產供給食糧，爲使百姓食糧充足，雍正帝實施種種重農措施。（圖四）大陸著名清史學者馮爾康教授指出，雍正帝爲推動農業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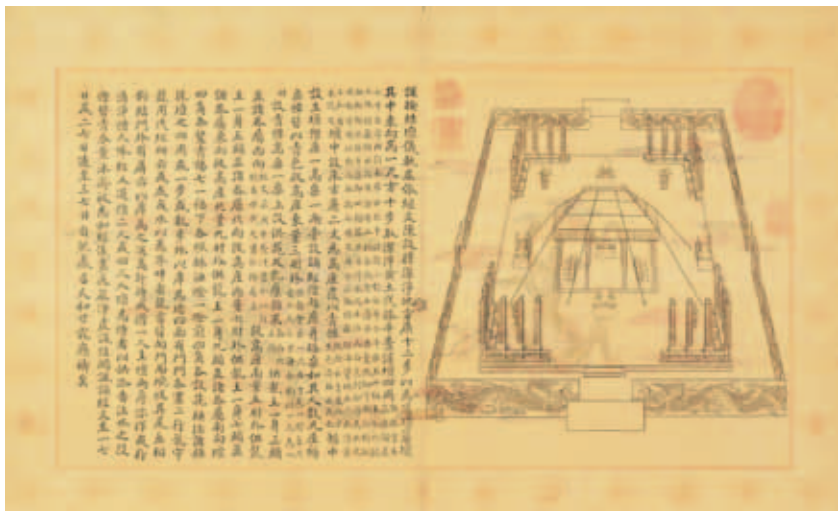
度的自然條件配合。每逢京師亢旱，康熙帝輒命禮部、順天府、內務府赴天壇總督住泰山祈求興降霖澤。有時旱象嚴重，康熙帝竭誠齋戒，深躬自

省，甚至清理刑獄，著各廟誦經，合意虔誠祈禱，以求天眷。祈雨事關民生，甚屬緊要，除了定期派官祈雨，康熙帝亦屢率諸臣，禱於天壇，每次行禮，均從西天門步行進出，以示虔

敬。北京初夏，雨量較少，康熙帝幾乎年年遣官祈雨，並親自爲民求降霖澤，自云：「昔年曾因嘆旱，朕于宮中設壇祈禱，長跪三晝夜日惟淡食，不御鹽醬至第四日，步詣天壇虔禱，油然忽作大雨如注，步行回宮，水滿兩韉，衣盡沾濕。」康熙帝敬慎虔誠求雨的真情，令人感動。康熙五十六年（一七一七），康熙帝對皇子及諸大臣說：

太皇太后不豫，朕以保育恩深、益復虔誠步禱，請減己算，爲聖祖母延年，詎意竟不可回。朕以此抱痛于心，知天道幽遠，難可期必，朕爲聖祖母不能祈求永年，而爲民請命，即使天心有感，能不負慚於中乎。自此以後，每遇求雨，朕但于宮中齋戒，不復躬親祈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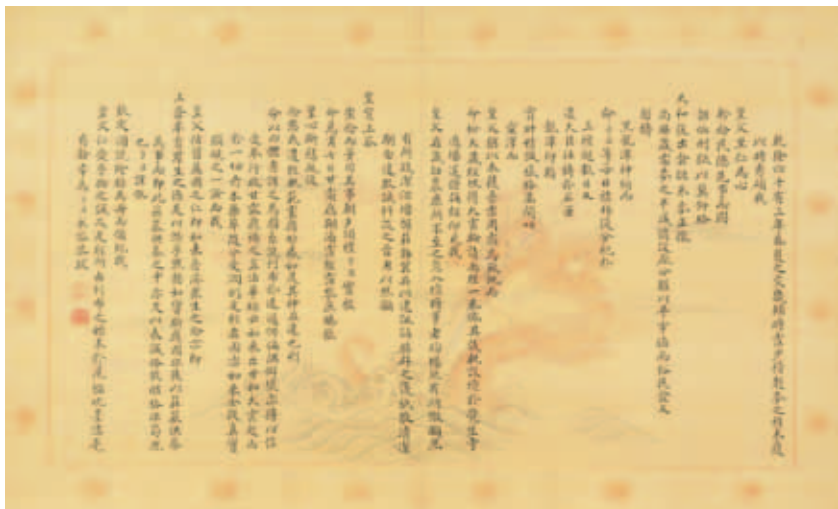
孝莊太皇太后撫育康熙帝，培養他成爲一代聖主，康熙帝亦不負祖母愛養之恩，孝敬有加，時刻關懷，經常在側服侍，難能可貴。康熙二十七年（一六八八），孝莊太皇太后病篤之際，康熙帝虔誠步禱，乞求爲祖母延



圖五-1 清 永瑆繪 《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》結壇道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-2 清 永瑆繪 《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》龍王畫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-3 清 永瑆繪 《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》欽定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乾隆帝認為《請雨經》靈應妙感，命皇太子永瑆譯成滿漢蒙藏四種文字，「為圖系說，刊布於遠邇」，「欽定圖說，繪錄為冊」。

新鮮，翌年便有外任官如法炮製。雍正九年（一七三二）十月，署理陝西總督查郎阿奏報德州地方現出「祥雲五色，具備光華絢爛，層層相間，如錦、如綺、如龍鱗。」相較於鄂爾泰，雍正帝對此反應冷淡，僅在奏摺

批「覽」字，顯然雍正帝選擇性地聽聞外任官奏報祥瑞，並非照單全收。
高宗祀龍 福國佑民
乾隆帝關心百姓生活，重視農業生產，認為務本足國，首重農桑，繼承前朝政策，提高農耕技術、提倡荒

地開墾、興修水利建設，使人民生活安定。乾隆帝關注農事，延續成例，諭命外任官定期報告氣象、農作成長、糧價行情、自然災害等情報。如遇少雨或久旱，乾隆帝便親臨天壇、黑龍潭等處祈雨。災荒嚴重時，除了

指示龍神祭祀事宜，各地督撫奏報亦繁，顯示龍神信仰對雍正帝具有特殊意義。
雍正帝喜好祥瑞，外任官體察上意，各地頻報祥瑞，屢見不鮮。龍為神獸，地位崇高，外任官發現瑞像，自然加緊奏報。雍正八年（一七三三）三月，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報，海口興工之際，神龍示現二次，其景「白龍摩空，全身俱現閃爍有光，鱗角、爪尾無不畢露，初黑後白，凌空而上」，雍正帝喜極稱批：「以手加額覽之。」鄂爾泰陳述神龍奇景，當為阿諛，本不足為信，然而雍正帝迷信禳祥，竟然表示額手稱慶，相信確有其事。若以自然科學角度析論鄂爾泰形容白龍奇景，「忽見雲從海起，風雨交作，見白龍上升，彷彿如前狀」，其景象疑為「龍吸水」現象，是在極不穩定氣候下，在水面發生強烈空氣對流而產生的龍捲風。這種自然現象，在中國臨海、湖之處，多有發生，新聞報導亦繁。神龍示現，相較於嘉禾、瑞穀、耆草、瑞芝、瑞麟、鳳鳥等超自然現象，題材

意：「頻年以來，朕虔祀龍神，福庇蒼生，歷有明驗。」雍正帝相信天人感應，誠敬祀祭，上邀天庥，福佑下民。
雍正帝雖然降諭曉示修建龍廟均係為民，然而觀察其作為，已超出祈福的意義，可從幾個層面觀察剖析：第一，雍正帝即位即建時應宮，供奉各省龍神，顯見虔奉龍神之誠。第二，雍正帝塑各省大小龍神像，命督撫迎請供奉，外任官唯有敬誠奉祀，以上膺天意。第三，雍正六年，雍正帝指出「兩暘燠寒，以風為本，亦宜特隆祀典，以答洪庥。」指示仿時應宮式樣，營建京師宣仁廟，祭祀風神，親自督辦建廟，垂詢細節，並令內務府提供支援，顯見極為慎重。第四，京師以外，雍正朝各地督撫奏請修築龍王廟、龍神廟、求賜御書龍王廟匾額的奏摺，既多且繁，遠超過康熙、乾隆二朝龍神相關奏摺總量，顯見雍正帝對龍特別推崇。第五，雍正帝不僅尊崇龍神，敕予封號，亦降旨祭告東海龍王，永鎮海疆。此外，雍正帝親臨黑龍潭龍神祈雨，再三降諭

省龍神位奉於各省，增修時應宮後殿，奉祀八方龍神，並降諭內閣，指出「龍神專司各省雨澤，地方守土大臣，理應虔誠供奉。朕特遣各省龍神大小二像，可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，虔誠展祀。」同年七月，命直省各建龍神廟。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二月，降諭內閣，說明禱祀龍神之

產，採取許多措施，諸如：授予老農頂戴、推廣精田法、開墾荒地、提倡社會等等，均係在帝制時代背景下，承襲歷朝政府重農抑末政策。雍正帝重視農本，實行相關措施，企圖提高生產，解決人口日繁，耕田有限，造成食糧不足的問題。其以農本與百姓為出發點，立意良善，仍值得肯定。
自然崇拜是中華民族的信仰特色，雲雨風雷，代天司令，雍正帝極為重視，不僅恪修祀典，更廣建龍廟，直接推廣龍神信仰。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二），雍正帝降旨興建時應宮，「前殿奉四海四瀆龍神，後殿中奉順天佑歲時應龍神，西旁左右奉十有七省龍神，設住持道士，以供香火。」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，移直

省龍神位奉於各省，增修時應宮後殿，奉祀八方龍神，並降諭內閣，指出「龍神專司各省雨澤，地方守土大臣，理應虔誠供奉。朕特遣各省龍神大小二像，可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，虔誠展祀。」同年七月，命直省各建龍神廟。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二月，降諭內閣，說明禱祀龍神之

火。」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，移直省龍神位奉於各省，增修時應宮後殿，奉祀八方龍神，並降諭內閣，指出「龍神專司各省雨澤，地方守土大臣，理應虔誠供奉。朕特遣各省龍神大小二像，可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，虔誠展祀。」同年七月，命直省各建龍神廟。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二月，降諭內閣，說明禱祀龍神之

龍神祠，祀典比照黑龍潭。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十月，命造辦處，「派員敬謹成造天下第一泉龍神祠，黑龍潭龍神祠銅祭器各一分。」¹乾隆帝不僅命造辦處成做祭器，並將之列入祀典，凸顯對龍神祭祀甚為重視。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，乾隆帝擴建清漪園，拓挖園中西湖，更名昆明湖，掘堤拓湖，形成南湖島，其中有龍神祠，修繕後，改名廣潤祠，作為園中祈雨之所。後因求雨靈驗，遂改為廣潤靈雨祠。（圖六、七）

帝制時代，人民對於自然科學認識有一定的局限性，相信神蹟，在所難免。乾隆帝相信祈雨妙術，歷年早象嚴重時，多次派人訪覓諸習祈雨人，並諭令官員從《春秋繁露》及諸史志中，查找各種祈雨術，挑選可行者，仿照舉行，多方設法，齊心協力，企求甘霖普降，裨益農田。乾隆帝退居太上皇後，雖已屆耄耋之年，仍不斷親詣禱雨，或命嘉慶帝赴玉泉山、黑龍潭龍神祠、廣潤靈雨祠等處祈雨，其盼澤殷切，益深慮念之心，充分反映乾隆帝關注蒼黎民生的思

維。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盛清諸帝勤政愛民，勸課農桑，發展農業，鞏固國本，時刻關心各地晴雨氣象與民生相關訊息，命各地督撫定期奏報雨水情形摺，即是透過外任官提供地方災荒訊息，作為預警系統，讓皇帝適時指示因應策略。人類面對自然環境，其實極其渺小，時至今日，依然難以完全抵禦天災侵襲和自然反撲，遑論二百年前的帝制時代。觀察現存《宮中檔》中，留有大量奏報雨暘情形的滿漢文奏摺，盛清諸帝實施具體的農業政策與投注救災防變措施，已經盡了人間帝王最大的努力。

盛清諸帝相信祭祀的力量，各有祈雨活動。降雨實際是氣候自然變化，豈能靠祭祀而轉變？然而，乾隆帝認為：「夫以天子精誠，通於神明，以之事天饗帝，罔不昭格，而況於龍神乎？信哉，誠之能感物也。」²盛清諸帝治理國政，兢兢業業，在預防和救災方面已盡人事，舉行雩祀，或向龍神禱雨，甚至命寺廟誦經祈福，無非在用心治國之外，輔以精神



圖六 《京畿水利圖》（局部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《清史圖典·乾隆朝（下）》
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乾隆帝擴建清漪園，拓挖園中西湖，更名為昆明湖，湖中南湖島有龍神祠，乾隆帝改為廣潤靈雨祠。圖中十七孔橋連結岸邊與南湖島，廣潤靈雨祠位於島上。



圖七 頤和園十七孔橋與南湖島 作者攝於2006年
頤和園前身為清漪園，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擴建，照片右方為廣潤靈雨祠，可與《京畿水利圖》對照。

等各種祭祀樂章，載入會典。³盛清諸帝信奉佛教，曾藉由誦經祈求佛力加被，濕降雨澤。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），雨水不足，禱雨成果不佳，乾隆帝命檢《大藏經》，「得《大雲輪請雨經》一卷，依其儀軌，設壇覺生寺道場，選僧誦經」，七日後，終降甘霖。《大雲輪請雨經》簡稱《大雲輪經》或《請雨經》，經文指出，誦讀此經即能降注甘雨，普獲安樂。乾隆帝因《請雨經》靈應妙感，命皇太子永瑤譯成滿漢蒙藏四種文字，欽定圖說，繪錄為冊，命名《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》，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（圖五）

指示辦理賑恤、蠲免、平糶等措施，減輕災情，度過荒歉，同時反躬自省、清理刑獄、步行求雨，祈求感召天和，甘霖普降。在乾隆帝大量詩作中，許多以〈喜雨〉、〈報雪〉，甚至龍神為題，充分反映他關心氣候與農業發展的治國思維。

乾隆帝重視祭祀，將雩祀儀注制度化。乾隆七年（一七四二），議准，嗣後每年孟夏，擇日行常雩禮於圓丘。祭典既定官祀，必需制定完

乾隆帝經常親詣京師近郊黑龍潭、玉泉山龍神祠與清漪園（今頤和園前身）廣潤靈雨祠祝禱祈雨。乾隆帝在位期間，親臨黑龍潭龍神祠祈雨達數十次，歷年亦遣官祭祀。乾隆二年（一七三七），乾隆帝敕建龍神祠於靜明園內玉泉山。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），敕封玉泉山龍神為「惠濟慈佑」龍神。乾隆十六年（一七五二），降旨鳩工崇飾玉泉山

力量，祈求國運昌盛，物豐民富，不應將這些舉止視為迷信，而應解讀盛清諸帝係以虔敬莊重的心情，祈求風調雨順，百姓安居樂業，兼顧具體施政和信仰力量，力求國家長治久安，其治國之用心，極其可貴。⁴

作者任職於中國文化大學

徵引文獻

1. 《大清聖祖仁（康熙）皇帝實錄》。
2. 《大清世宗憲（雍正）皇帝實錄》。
3. 《大清高宗純（乾隆）皇帝實錄》。
4. 世宗御製，《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。見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三〇〇冊。
5. 清·唐執玉，李衛等監修，《畿輔通志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，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。見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五〇四冊。
6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宮中檔雍正朝奏摺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七。
7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一。
8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七。
9. 崑岡等奉敕修，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，臺北：臺灣中文書局，一九六三年。
10. 馮爾康，《雍正傳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八。